

周婉窈，〈臺灣文化的迂迴之旅——從蔡瑞月的舞蹈生涯談起〉，《身體與自由：凝視臺灣文化史中的蔡瑞月》（第一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），頁15-18。臺北：財團法人台北市蔡瑞月文化基金會舉辦，2006年11月11日。

# Schedule 論壇流程

時間

主題

【傀儡上陣】蔡瑞月作品／莊媛婷、王有丞演出

【Snow? Sakura · Roaming around the Path (雪?櫻·漫徑) for Harp Solo】

李思嫻作品／管伊文、詹曜君演出

開幕致詞

主持人：蕭渥廷（蔡瑞月文化基金會董事長）

13:00~13:20

## 第一場：身體與自由

身體與自由：想像台灣政治思想史中的蔡瑞月

主講人：吳叔人（論壇召集人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）

從女性紀錄女性看蔡瑞月與蕭渥廷

主講人：黃長玲（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、婦女新知董事長）

音樂、舞蹈、蔡瑞月——談台灣人的身體

主講人：楊建章（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助教授）

綜合座談

評論人：李敏勇（作家）

13:20~14:30

## 中場休息

【Three Poems by Sylvia Plath for Soprano and Chamber Ensemble】

蔡凌蕙作品／李春峰指揮、楊子珊、盧耿峰、楊蕙祺、曾憲文、林蕙蕙、王怡鈞、廖韋旭演出

## 第二場：台灣文化史

台灣文化的迂迴之旅——從蔡瑞月的舞蹈生涯談起

主講人：周婉窈（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）

從文學史角度看「台灣舞蹈」的可能內涵

主講人：李爽學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）

幸而有遺忘 II (為蔡瑞月)

主講人：石計生（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）

綜合座談

評論人：阮斐娜（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教授）

15:00~17:30



蔡瑞月1953年作品〈機器上朝〉

## 臺灣文化的迂迴之旅——從蔡瑞月的舞蹈生涯談起

周婉紡（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）



一九三七年在臺灣歷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，這一年日本稱爲「支那事件」的蘆溝橋事件發生了，臺灣逐漸進入「非常」時期。這一年，十六歲的蔡瑞月來到東京，跟隨石井漢學習現代舞，其後師事石井綠。在此期間，蔡瑞月曾先後跟隨舞蹈團前往日本佔領的東南亞等地「

勞軍」。一九四六年，蔡瑞月和許多臺灣知識青年一樣，滿懷著理想和期待，搭船由日本返回故鄉臺灣。他們在船上編織著「新建設」等美夢。的確，戰後最初的一年半載裡，臺灣社會熱鬧非凡，文化藝術活動百花齊放，臺灣的領導菁英、知識青年、藝術家彷彿非把所有的生命力發揮出來不行。舞者蔡瑞月拚命地跳，他說許多單位來邀他演出，密集到三、兩天就有一次演出，他認爲這是「非常有活力的時期」。這或許是戰後臺灣文化藝術史上最活躍、最具有創造力的一段時期。

但是這一切，在二二八事件，以及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中，

都一一被碾除了。如果蔡瑞月曾經是雷石榆詩中的「海燕」，那麼，他成爲一隻被翦了翅膀的海燕。蔡瑞月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和詩人雷石榆結婚，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兩個多月，臺灣省政府剛公布完成「清鄉」工作。雷石榆是臺大教授，婚後蔡瑞月忙於跳舞、教舞，在這過程中兒子雷大鵬誕生了。快樂的歲月維持了兩年，一九四九年六月雷石榆被捕，關了幾個月後被流放到廣東，接著蔡瑞月也被捕，關了三年。四十年後，這對被白色恐怖活活拆開的夫妻再度見面，雷石榆賦詩曰：「蓬萊恩愛兩春秋，先後無辜作楚囚」，簡潔地點出這段本事。「楚囚」是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詞語，對陳言套語的「熟悉度」往往讓我們忽略了以個別的生命所體驗的活生生的、無可取代的真實。在這裡，我不想去述說白色恐怖的恐怖、以及西本願寺地下的殘酷物語——好個諷刺性的地點，西本願寺？！讓我們看看回來的蔡瑞月吧。

從綠島被釋放回來的蔡瑞月，是幸運的。那是拿他來和那些被槍決，或關了二十幾年的政治犯來作比較。他沒瘋癲，他繼續跳舞、教舞，而且成爲舞蹈界的代表性人物。我們這一代人，也許不知道蔡瑞月到底做了些什麼，但大致上總知道他的大名，而且是和舞蹈連結在一起的名字。雖然如此，出獄後的蔡瑞月的舞蹈生涯，是被剝奪自由的，是不許成長的；更糟糕的是，他必須在各種主被動終究分不清楚的框框中創作。他的老師石井綠，在戰後的日本繼續跳舞，擁有創作的自由，不斷成長，永不止息。蔡瑞月則是一隻鐵羽的海燕，他在那樣的環境中，能夠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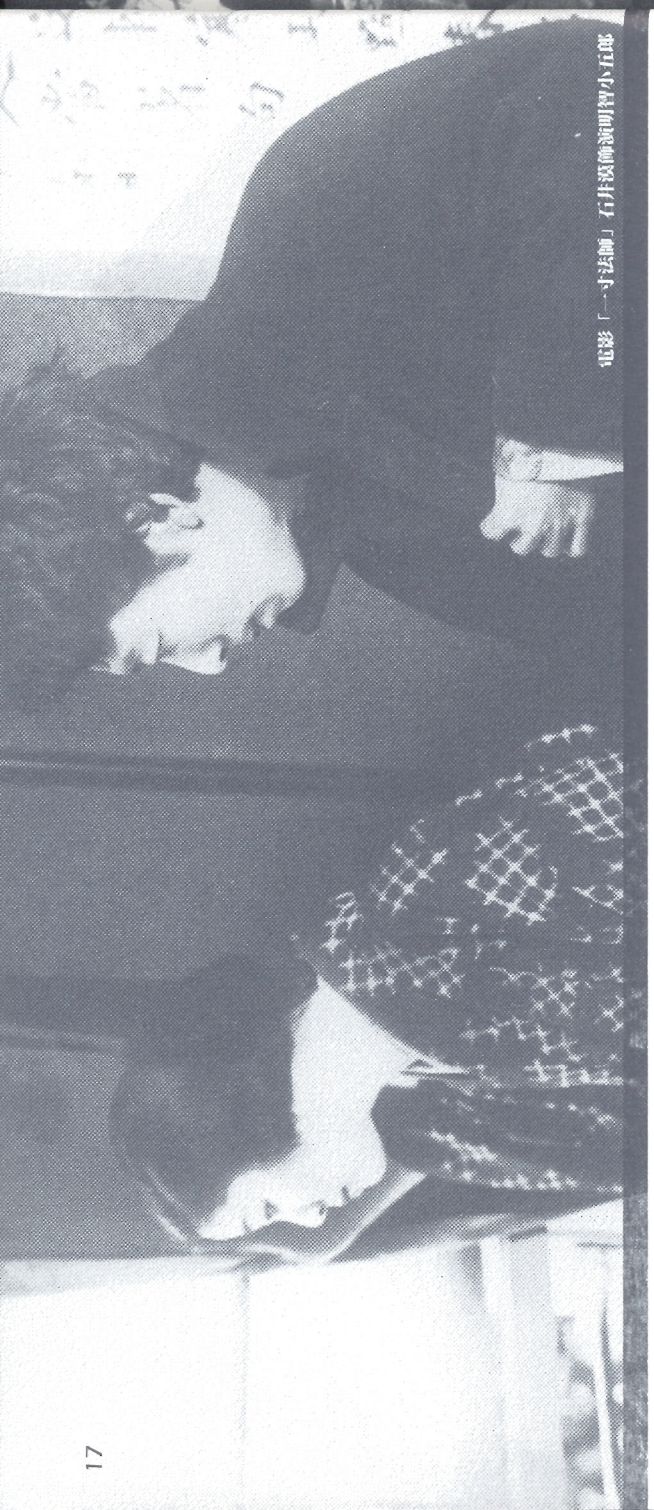
此堅持，令人十分感佩，但就舞蹈的創作而言，我不能不認為，蔡瑞月如同許多臺灣的文學家、藝術家一樣，走了一條迂迴的路。不，如果迂迴而能抵達目的地，那也還好，問題在於，臺灣文化似乎永遠在作「徒然之旅」。此時我的腦子裡，浮起日文「無駄」（muda）二字。無駄になつたなあ。

我對舞蹈和舞蹈史，是個大外行，在這裡，我不是要提出我對蔡瑞月舞蹈的評價，而是想從蔡瑞月喪失創作之自由這點來談臺灣文化的問題。讓我們再回到緞羽之燕的比喻吧。我剛回國時，有一次參觀親人購買的新宅，是一大片新開發的大樓社區，廠商為了招攬生意，在庭院的池塘中養了一隻黑天鵝，「優哉游哉」，很美麗。我的小姪女說那隻天鵝被剪了部分的翅膀，不能飛了；小小的心靈為此很不平。廠商當然是為了賣點。被剪了翅膀再也不能飛的黑天鵝，的確很可憐。它被剝奪了飛的自由，而我們在池邊觀賞的看客，果真得到好處嗎？表面上是，實際上不是。在天鵝被剝奪飛的自由的同時，我們也被剝奪了欣賞天鵝展翅而飛的天然之美。那是一種集體的損失。當蔡瑞月被剝奪作為舞者的創作自由時，我們同時也被剝奪了某些寶貴的東西。

我們研究臺灣歷史的人，大都有這樣的感觸，臺灣各行各業的菁英分子，一到了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，不是這位，就是那位，消失了。現在社會上流行

一個說法，主張我們要走出臺灣歷史的「悲情」。我不是很清楚這句話的意思。如果說不要沒來由的「sentimental」，或是呼籲大家不要拿「悲情券」兌換政治或現實的利益，我可以接受。但是，如果這句話是要我們「忘記」這些事，我感到很困惑，我們都還沒真正了解，怎麼就要想辦法忘掉它呢？這幾年，我常常在思考一個問題：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，除了對個別的個人造成不可挽救的傷害之外，到底對臺灣社會造成怎樣的斷傷？或許這樣的思考還在我們的視野之外。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所剝奪的，不只是當事人的生命和自由，更嚴重的是，二者剝奪了我們賴以為成長的精神、文化資產。以下容許我以個人的經驗為例，不是要「個人化」這個觀點，而是想「就近取譬」，相信其意義不限於個人。

我出生在嘉義縣大林鎮，小時候喜歡畫圖，國小時被學校派到嘉義公園參加寫生比賽。嘉義公園綠樹成蔭，榕樹的根都伸展到地面上來，有個大池塘，也有人工噴水池，非常美麗。但是，我從來不知道我們嘉義有位畫家叫做陳澄波，他畫過嘉義公園。我知道他的名字，已經到了大學都要畢業了，他的畫作也要到這幾年才比較熟悉。陳澄波被槍決時，五十二歲，已經是個相當成熟的畫家，活躍於全島以及地方藝術社群中。在正常的社會，他一定會是我們這些小小畫家的楷模，嘉義的景色也會是我們用心描繪的對象。



電影「一寸法師」石井淑雄飾演明智小五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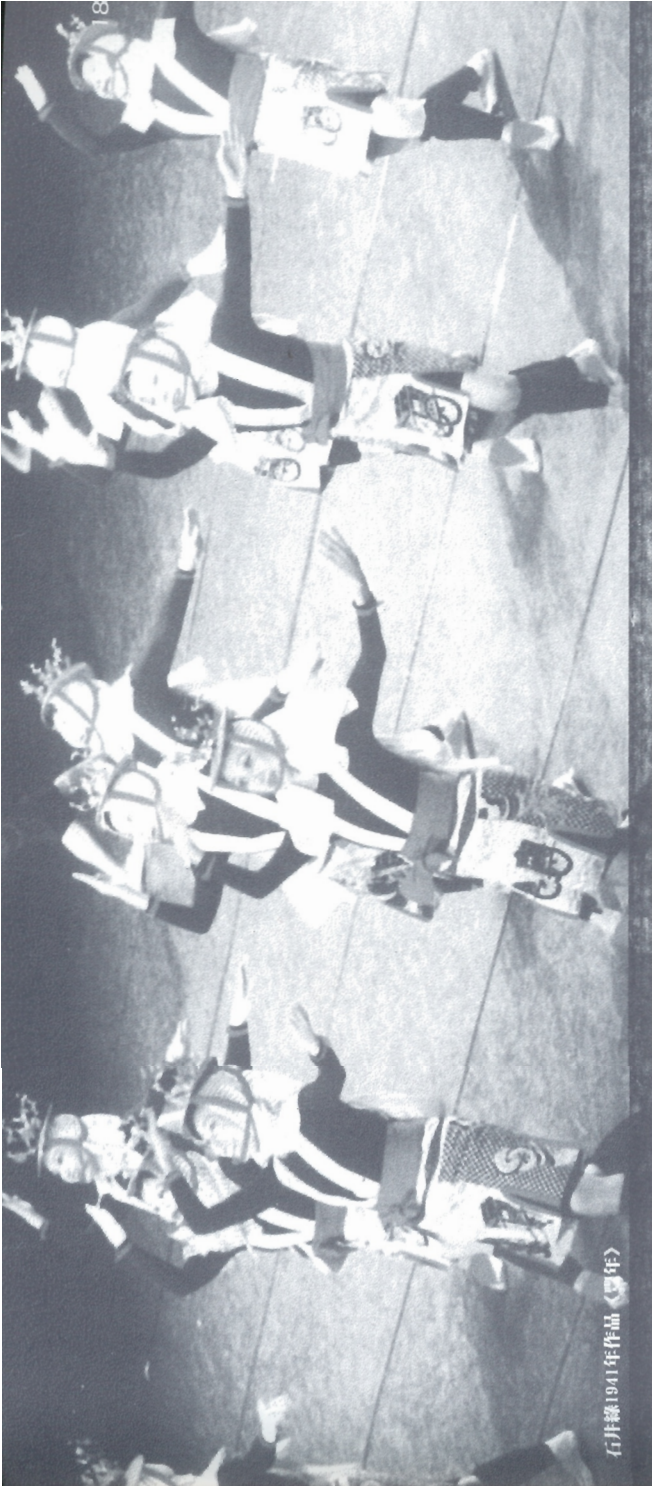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作為嘉義人，我們被剝奪了陳澄波所可能給我們的东西。

這幾年，鄒族的高一生（Uyongu Yatauyungana，日本姓名矢多一生）的生平和音樂，逐漸受到大眾的注意，光是去年一年就有許多相關的活動。即使如此，社會中知道「高一生」這個名字的還是少數，我們常遇到的反應是，「啊，我還以為是高一學生呢？」高一生也是我們嘉義人，他的被處決還曾決定了我父親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抉擇，也因此間接影響了我的人生。這是我在最近一年多才得以知曉的。但是，在這裡，我不想談這一段因緣。高一生於一九五二年被捕，一九五四年遭處決。他富有極深的人文素養，喜愛哲學、文學與音樂；在公共事務方面，致力於為族人謀求福利，主張原住民自治。這樣一位人物，我要到他罹難半世紀之後才逐漸認識他，才聽到他的音樂。或許今天的高一生研究還具有濃厚的「英雄與英雄崇拜」的色彩，但就算我們進一步了解他，「解構」英雄史觀，我相信他仍然是一位相當特別、相當傑出的人才。但是，在我的成長過程中，我無由知道他，遑論他的生與死的歷史背景了。

陳澄波與高一生不過是無數可以列舉的例子之一。我們無由認識這些可以給我們啟發，可以作為我們人生楷模的優秀人士。取而代之的，卻是負面的人物。中共在清算異議分子時，流行很多標語式的語言

，我印象很深的一句是，「正在走的走資派」。我感覺這句話特別生動，因此在我無聲的內在獨白中，我常常套用它。我告訴自己，在我年幼時，在我的家鄉至少看過「正在走的臺灣紳士」。但是他們不是邊緣化，就是移居都會區。到後來，我再也看不到正在走的紳士了。在我家鄉崛起的是，一些奇怪的人，比如我們的鎮長是妓女院老闆，他「self-styled」，留八字鬚，穿卡基色軍服、高統靴，走起路來，鏗鏘有聲，活像從舞臺走下來的民國軍閥。他連選連任。就此而言，今天媒體的搞怪文化，可以說其來有自。由於家庭和社群殘存的價值觀所致，我深知此人不足取。於是，我們就在這種負面的教育中長大。我回思自己的成長過程，好像總是不斷提醒自己：長大以後，絕對不要像某甲、某乙這樣、那樣的……。

近年來，我常在想，正面地學習楷模，應該比負面學習要好得多。因為，我們在「反」面學習時，往往不知道如何做才適當（缺乏實際的模範之故），也很可能矯枉過正。好像可以構成一則童話的本事：長在亂麻叢中的小麻渴望自己能長直，但它可從來沒看過什麼是直……。如果說，我們的時代已經這麼不容易了，那麼在積非成是的今天，社會教育的結果豈不更令人擔心？這又是臺灣歷史另一個環環相扣的嚴肅問題了。總之，我認為，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思想肅清運動，把臺灣重要的菁英以及未來的菁英剷除殆



石井線1941年作品《青年》

盡，倖存者嚇破膽，真是「de-moralizing」，這個歷史過程對臺灣社會造成了很大的負面的影響，今天，我們還活在這個巨大的影響之中。不要說道德性的楷模，我們成長過程中，文化、藝術方面的資源可以說非常貧乏薄弱，今天顯現於媒體的虛無、空洞、低俗、惡趣，是否也是這樣一個「去道德化」的結果呢？值得我們思考。

今天不論研究蔡瑞月、陳澄波，或是高一生，我們都必須回頭看他們在「日本時代」的那一段生涯。這一段歷史，雖近而遠。「近」指時間的鄰近，「遠」指認知上的困難。時間的鄰近可能讓我產生錯覺，好像很容易就可了解掌握，實際上卻不然。他們的生涯要求我們把他們「接」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，這是一個近乎普遍的現象。不回頭探究那一個時代，以及他們在那個時代的存活樣態，我們是無法掌握臺灣的文化的。在這過程中，我們好像像在繞圈子，又好像一切都要回到原點，甚至「歸零」了。戰後臺灣文化的進程，彷彿走了一條迂迴之路，越趨不前，或者不知該往哪裡前進。

在理解上，我們如何「接」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。是要像接枝般「直接」接上去呢？還是必須注意作為文化載體的殖民地子民的自主性？——如果有的話。前年我對林獻堂家族創辦的「一新會」作了一些粗淺的研究。我發現林家是有所堅持的，他們在文化上

對殖民者採取了一種抗衡的作法（如果談不上抗拒的話）。另外，我再度深刻地了解到霧峰林家文化生活的健康與豐富，而臺灣的「社區總體營造」恐怕要推原於林攀龍了（可惜主其事者大概無此認知）。我當時有很深的感慨：如果霧峰林家的文化生活是臺灣社會共同的認知，那麼我們的文化或許就不會如此一路往低處走。我們的有錢人也會有足以大大學習的具體楷模！對歷史無知的人群，註定要不斷繞圈子吧。

#### 周婉窈

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、碩士，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。曾任教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，一九九四年返國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，約十二年，今年（2006）秋天轉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主要的研究領域為臺灣史，以前曾從事過清代婦女史的研究。過去十餘年致力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最後八年的研究，試圖了解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人的心靈圖景，涉及的課題包括國家民族認同、歷史認識、鄉土感情、道德觀念，以及實學精神等。著有《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》、《臺灣歷史圖說》、《海行兮的年代——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論集》，以及論文多篇；偶爾也寫散文。目前除了全職教書之外，正著手撰寫臺灣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「十七世紀的臺灣」。